

AN GANG 安岗

新闻工作
50年

XIN WEN
GONG ZUO
WU SHI NIAN

经济日报出版社

AN GANG 安岗

新闻工作
50年

XIN WEN
GONG ZUO
WU SHI NIAN

经济日报出版社

AN GANG 安岗

新闻工作
50年

XIN WEN
GONG ZUO
WU SHI NIAN

经济日报出版社

AN GANG 安岗

新闻工作
50年

XIN WEN
GONG ZUO
WU SHI NIAN

经济日报出版社

安岗新闻工作五十年

经济日报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B 593929

责任编辑 张世彦

陈 佩

封面设计 司兰星

责任校对 徐建华

安岗新闻工作五十年
ANGANGXINWENGONGZUOWUSHINIAN

经济日报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天津牛家牌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8.125印张 175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2.75元

ISBN 7-80036-068-7/G·3

前 言

《安岗新闻工作五十年》一书是根据纪念他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年(1936—1986)座谈会上同志们的发言和以后一些同志写的文章编辑而成的。安岗同志1936年为当时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写过十余篇通讯(只找到几篇),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从1938年起从事党的新闻事业。他在《人民日报》工作40年,后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主席。

编 者

目 录

前 言

感谢友人 鞭策自身·····	安 岗(1)
笔政五十年·····	葛 炯 陆宏德(15)
走中国社会主义新闻教育的路 ·····	蒋曙晨 齐志文(26)
安岗的新闻研究思想·····	陈崇山(52)
《胜利报》始末纪略·····	刘 江(60)
《胜利报》和安岗·····	曹 今 李 致(82)
回忆初创时的晋冀鲁豫总分社·····	张连德(93)
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	钟 山(120)
宣传商品经济的带头人·····	于 明(132)
搬不走的新闻学“教科书”·····	范敬宜(142)
他的新闻敏感·····	林 里(145)
创新意识与党性·····	明 理(152)
老安我师·····	陈勇进(159)
四十年话友谊·····	商 恺(166)
特快列车上的祝愿·····	翟向东(176)
值得借鉴·····	肖 风(184)
处处留心皆学问·····	宋 琤(189)
长征路上采访的五次见面·····	罗开富(196)
领导、老师、榜样、挚友·····	高 粮(210)

两次采访.....	燕 凌(214)
跟随安总采访记.....	段存章(220)
早年的新闻活动及作品特点.....	周 洁(232)
安岗印象记.....	王庚虎(241)

感谢友人 鞭策自身

——在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周年会上的发言

安 岗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老同学、新闻界我的老战友、老同事，为我从事新闻工作50年开纪念会。同志们说了发自内心的话。我感谢同志们给一个新闻老兵的深情厚意；同时，也感到惭愧。我的惭愧不是开纪念会才有的，而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有了。那时候，我去采访起义的高树勋将军、采访被俘的马法五将军、采访同国民党展开争夺战的战场。我工作之余颇有一点刺痛，就是在抗日战争八年期间，我浪费了不少时间。我念书太少，打扑克的时间不少；坐下来思考问题的时间少，闲聊天的时间不少。荒废了不少大好时光。到了解放战争和以后的全国解放，担负中央级报纸的报道责任时，感到了自己后劲不足，才疏学浅，常常悔恨未能充分利用太行山八年抗战时间，把自己的脑袋多充实一点儿。吃后悔药是没

有用的。自己多少还有点不甘落后的劲儿，在实践中尽最大努力去掌握形势，体会政策，尽可能多地发挥作用。记得高树勋将军邯郸起义后跟党中央商量，要给蒋介石发一个电报，陈述他对时局的看法。组织上让我起草这份电报，字数为2500字，要用高树勋的语言，有点官腔官调，也要用一些古文。给我三天时间。我不知深浅，头一天在古文上咬文嚼字。自己虽然念过两年古文，到现在只记得一些孔孟的“语录”，但一参加革命把古文给打倒了，现在要学古、用古，就是“古”不上来。当时，朱穆之、陈希玉和我住一间屋子，我同他们商量，到底该怎么写？他们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反正是装腔拿调就是了。这时我想，如果我小的时候用点功，肚子里头要有100篇古文，现在就不会太吃力了。但毕竟还是有一点古文底子，就使劲往里面抠。最后，通电写成了，延安新华社一字不改发出来了，还登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重要地位上。高将军见我说，你给我代写的通电，够味，我很满意。听了这话，我心里并不是味儿。这时我认识到，一个不会充分利用时间学习的人，不会有多大出息，至少会遇到许多的烦恼。

50年侥幸过来了。我50年没离开新闻事业，没离开写东西。虽然主要的时间是做的领导工作，做夜班工作，做编报工作，写的大多是社论、评论，但也常常忙里偷闲，下去跑一些地方，匆匆写点东西。80年代过去了几年，出了5本书，太可怜了。应该不是5本，而是10本、20本。这不是做为一个新闻老兵的忏悔，而是向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向我们中年的同志们提出的一点发自内心的、不带任何一点外交辞令的忠告。

我是相信人的能力自觉开发的。一个人，一生应该是灿烂

的一生。生命是要人自觉去开发的。灿烂的一生需要非常雄厚的基础的。基础是在尽可能不浪费时间的情况下一点一点打下的。基础打得越牢，自己就能够越掌握主动，就能够在形势变化的瞬间起飞，说不定能够成为象范长江那样传扬四海的名记者。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没有把自己开发出来，是个平庸之辈。希望大家以我为鉴得到一点启发。我的结论是一个人要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掌握一点安排自己命运的自主权。要探索开发自己的能量（包括潜能）的各种方案。逆境、困难、牺牲不可怕，可怕的是因循苟安、无所作为，不求上一个又一个的人生阶梯，突破一道又一道的人生难关。

在我50年的工作中，有深深感触的还有以下几点：

我能够50年坚持从新闻岗位上走过来，应该感谢最初领我走上新闻岗位的前辈们，包括党组织的同志，包括新闻界的老前辈。从党组织来说，1935年我在天津汇文中学上高中时候，就与党组织有了联系，我能够有面向社会、研究社会、探索社会问题这点勇气、这点思想，是跟党的启示分不开的。我参加了党领导的救亡活动，参加了社会教育活动和各种学生运动。天津的“一二·九”运动我参加了。我对于红军，对于党，对于毛泽东、朱德，对于真理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有了认识。一个人的一生的贡献，就是要为人类做出自己的牺牲。这一思想，使我在一生中受用不尽。虽然我读书不多，但当时我知道叶青的言论是错误的。我成为天津党组织和群众运动的一个积极分子。从此奠定了我50年工作的基础。这些同志有的还健在，如程宏毅同志、姚大衡同志、王健同志、纪波等同志，人数不多，但当时我们在天津是一个敢想敢干敢闯敢拚的集体。天津党组织的教育，同学的互相帮助，使我在1936年确定了自己的方向、道路的目标，并

一生为之奋斗。

另一方面，我要记住两个人，是他们把我领进新闻界的。一个是罗隆基先生，当时他在天津主持笔政，每天为《益世报》写社论。他的社论有抗日的激情，有反抗敌人的呼号。1936年敌人曾放出风来说，如果他每个星期仍然去天津的青年会演讲，就要暗杀他。听到这个消息，我每个礼拜都要去青年会，看罗先生是不是还去演讲，看敌人是不是要暗杀他；看暗杀他时我能不能助罗先生一臂之力。他写的抗日的社论，宣传正义。我认为，这样的人是可以做为我的榜样的。另一位是《益世报》社会服务版的主编吴秋尘先生。我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要求是向他提出来的。接到我的信，他找我去。吴先生当时并不信任我，但还是接见了我，鼓励我试一试。我写好以后，发表第一篇的时候，他加了编者按，肯定了我写的东西。吴先生是我最早的新闻老师。他曾带我去看了“粥场”。去看时，我想，“慈善”家会给穷人喝粥，穷人可以苟延生命，总比倒毙街头好一些。但到里面一了解，发现那里面有很大的剥削：“慈善”家给粥里掺大量的水，还掺了沙子，使我看到了“慈善事业”里面也有一点伪善性。吴先生说：“你应该写一篇”。以后，吴先生经常鼓励我，要我多写文章。他说：“现在多写，是为了给将来写好打基础。你写的东西我很喜欢，因为没有旧记者的味道，笔调清新。”后来，日本人通缉我，党组织把我介绍给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我走了，来不及同吴先生告别。前几年，我去天津，《天津日报》研究《益世报》报史的同志告诉我，因在日本占领时期《益世报》有些问题，跟吴秋尘有多大关系似乎也没弄清楚。解放后，他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后来被打成了“右派”，送到东北劳动，

死在东北。说明我50年新闻工作的历史的时候，我不能不提到这两位先生，他们都被打成“右派”，不管怎样，我不能忘掉历史，忘掉影响自己成长的前辈。我永远怀着对他们的感谢和敬意。

在我50年的新闻工作中，起决定影响的人物是我在30年代就认识的党的领导者薄一波同志。1936年到了太原，薄一波同志当时是党的负责人，他是代表党同阎锡山合作主持山西抗日运动的，也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老革命。他的传奇式的革命生涯，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他的领导艺术，我很敬佩。从30年代到80年代，也就是现在，一波同志一直给我以关心和教导。我第一次见他是1937年4月在他的办公室。我和我的战友纪雨秀同志一块去见他。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CP（即共产党）还是CY（共青团）？”我说：“我是相信真理，愿意为真理奋斗的人。”听了我的回答，他笑了起来，然后他就谈到我的名字，说：你的名字“安”字是原来的，“钢”是后改的。我说是。他问我原名叫什么，我说叫安正元。他说你的名字“钢”，对山西的上层人士有刺激作用。确实，我是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以后，把安正元改成安钢的。一波同志说：这个“钢”俄语叫“斯大林”。“斯大林”就是“钢”。有的人知道你的名字的背景，会引起人们对你的不必要的注意，这样不利。他就把“钢”字改成了“岗”，就是我现在名字。我曾问一波同志：阎锡山能不能抗战到底？他说：听其言，观其行。从现在看，出于各种利害的考虑，他愿意抗日，我们跟他合作抗日。但不能保证他能和我们合作多久，时间是算不出来的。以后纪雨秀同志问他：抗战是持久战，大概能战到什么时候？一波同志笑了笑，说：马克

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我们能够算到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但不能算到什么时候战争能够结束。

刚到太原，我是在“民众训练团”的一队（这个团共五个队）。一队来的都是平津大学生，分两部分人，“民先队”和进步青年，这是大多数。另一伙人是“蓝衣社”的。由于生活很苦，蓝衣社的大多是公子哥儿，支持不住，大部分人很快就走了。这就形成了我们党的和民先队的优势。我们一队的指导员是我50年来的老大哥、老战友刘有光。还有老大哥王鹤峰、严佑民等同志，他们是老革命。刘有光是一队的工作员，我们彼此关系很好，我当时也是民先队的负责人。一天晚上，我睡着了。有人小声叫我，我出去一看是刘有光。他告诉我：宋哲元逮捕你的通缉令已到了太原。一波同志要我转告你，山西会保护你的，你知道就是了。听了这话，我没有任何不安，我相信在山西有党、有民先队、有好的形势，宋哲元的通缉令是不会发生效力的。这件事发生在1937年初。

我要讲一讲50年来我的过失。

我个人没有犯过政治错误，但我确实感到在几件事上有着教训。在“左”的路线下，一个人能不能顶住“左”，能不能对错误倾向有点警觉。这是对一个人政治品质的考验。我经过几次考验：在整风运动中，我在张磐石同志的领导下，我们的整风运动没有搞流行的“左”的残酷斗争那一套，团结了同志，这是好的。但是，为了对付上面的“指标”还是用了一些“左”的办法，而且是可笑的。比如，内战一开始，我跟随刘邓大军从太行山下到平汉前线，连我一起是三个人，这就是晋冀鲁豫前线总分社，我是新华社的特派记者，张连德同志是报务员。张连德同志在整风运动中，有人给他写了一份“爱护材料”（这是一个被打成“特务”的人被逼不过，胡乱

瞎编的“材料”）。这份“爱护材料”转到我们整风班。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件事，但因在运动火头上，对上边要有个交待。知道是好人受连累，不能采取其它地方“残酷斗争”的办法，为了给上边交帐，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大家想办法，有人想出了一个“选举特务”的“对策”，大家选举张连德同志为“特务”。连德知道是逢场作戏，但对为什么选他，是不服气的。解放战争时，我奉命到前线，就带上连德去发报，我选他一是因为他是可靠的好同志，又是业务上的好手。他问我：我的“特务”帽子怎么办？我说我心里有数，历史会证明你是好同志。我们两人合作得很好（我是从小看他长大，时间越长，我越敬重他。他是多面手，业余爱好很多），他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后来成了跑司令部写战报的优秀记者。这么一个同志，当时用应付“左”而不能不用“形左”的办法交了帐。这件事情，是做得不对的。它至少使连德的心受了委屈，我向他道了歉。整风班没有残酷斗争，但一切“左”的表现，我都负责。我们自己没整一个人，但外来的“爱护材料”很是厉害，我们不能够到各地调查，没有办法。对人的政治问题，由整风班“审干小组”负责，凡是有“爱护材料”来的，“审干小组”都要处理。“文革”后才知道，对有“爱护材料”的同志，都放在本人档案里。抗战胜利了，前方要人，整风班不整了，大家都去了前线 and 后方，大批干部南下了，很多档案里夹有“爱护材料”的同志到前方开辟工作，都担任了领导。“文革”中，一翻档案，夹有份“爱护材料”，这些同志挨了整，天天有人找我做调查，这时我才知道这件事。凡是我证明的，我都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为同志们做了结论，说明“爱护材料”是假的，都是逼出来的。受冤枉的同志都是好同志。我愿意借此机会向这些受委屈的同志表示我的歉意。

反右的时候，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新闻系主任，也是系党总支委员。许多同志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鸣放”，在“鸣放”时，争相发表意见，大家的意见我看都是正确的。响应党的号召对党提意见（有的不过说了一两句支部书记的缺点这类的话），是大好事。即使不准确，也应该允许和欢迎。可是很多好同志提意见而被打成了“右派”。尽管开会确定“右派”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保护一些同志。但是，我却没能使同志们幸免于难。当时最坏的是上级订指标，搞攀比，一刀切。我们当时应该顶住并向上反映情况，据理力争，实事求是。我们不搞运动，不去攀比，情况就会好得多了。在大气候下新闻系是个目标，躲不过去。我们没能这样。对此，我作为系主任，保护好人失职，应负一定责任。我要再一次向这些同志道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没有提出拨乱反正的时候，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志向我提出各自的问题，我根据事实，协助党组织为摘掉“右派”帽子做了我应做的工作。

今天，在座的有陈敏同志。她是我们新闻系的同学，是一位热心肠的好同志。当时受了冤屈。她是一位从小参加革命的同志。解放前，她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个很活跃的地下党员；在新闻系上学的时候，依然很活跃。因为活跃，惹得个别人不高兴。凡是受冤枉的人都受到飞来的横祸，祸根在领导的“左”倾错误。记得一次我去济南，在火车站看到了陈敏同志，她可能是去下放劳动。我当时很矛盾，作为师生，我们应该打招呼，我也打算把我的看法说给她，也想了解她的遭遇。当时不知道她看到我没有，一闪而过。我终于没鼓起勇气同她说话。我看见她身边有好几个人，怕给她带来麻烦，同时也怕给我自己惹来麻烦。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留

下阴影。一个献身于自己所信仰的真理的老党员懦弱了！这种懦弱行为引起我内心的不安。正因如此，三中全会后，当有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时，我就下决心为我们新闻系中受到“右派”这种错误待遇的同志们平反，说到当时的反右派，我认为不完全是新闻系系总支的错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造成许多错误，这不仅是一个基层组织的问题，而是党的问题。当然，处在各级领导岗位的干部，在执行错误决定的时候，是可以减少错误或者不犯错误的。不是有的部门就没有打一个“右派”吗？共产党员之所以是共产党员，就是因为他的头脑里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无畏无私的革命精神。盲目执行一切决定，不会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做一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负责。有些人办事唯上不看下，唯自己安全不顾别人死活，甚至恶性膨胀，只要自己作官，不管人民疾苦，唯权是问，唯利是图，唯官是保。这样的党员过着舒服的日子而恬然自乐，如果遇到大风大浪，将何以自处？

到了反“右倾”运动时，我在人民日报社又遇到一次小风浪。当时参加一个会，从庐山上出的题目，让大家“鸣放”，也就是“钓鱼”。一些同志发表了意见，要求我们的党改善工作、改变工作作风。这些意见本来是正确的，但不料很快就被与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挂了钩。说什么“右倾机会主义不仅在庐山上，人民日报社也有。”会上，有人就提出开除那些提意见的好同志。这几位同志知识、文化水平比我们高，在解放区时，工作很出色，但遭到个别人的“偏爱”。有人总想把他们做为“异己”开除出党，运动一来，他们就成了被打击的目标。由于我受到了“反右”的教育，在会上，我同想整人的人进行了争论，使被害人的受害程度和被害者的范围缩

小了一点。“文革”十年，我没有给自己戴“走资派”的定性帽子。姚文元、陈伯达一伙对我的批示中说：“此人只能做一般工作”，“长期考察”，也就是说是个“控制使用”分子。我觉得自己很主动。我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听到林彪事件传达，我自己买票回到北京，不再去干校劳改了。后来在人民日报新闻研究所工作时，曾为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出专刊。姚文元看了，说我是“反革命”，到唐山地震灾区“锻炼”。在我装病不上班的时候，报社的“四人帮”代理人又几次催我到干校劳动。一天晚上由迟浩田同志率领工作组进驻报社，通知我开会，粉粹四人帮，要我工作，我也就欣然从命了。

在我调经济日报社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份评价性的材料，内容是两条：一是思想政治路线是好的；二是想得多，干得多。没有明说的话是：“异想天开”、“不务正业”。这顶“不务正业”的帽子，我已戴了几十年，越戴越觉得舒服。想得多总比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强一点。干得多，无非是要把我们的事业扩大一点。“不务正业”的实例是很多的，比如办《市场报》。因为《人民日报》不能用很大的篇幅报道市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信息提到了议事日程，如果有一种刊物专门反映市场经济是很有用处的。当时主持中宣部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支持办《市场报》。上午我们送了样报，中午就发回来了，还说：“办好后还可以外销。”把眼光转向商品经济、转向市场，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好，都是正经的事情，怎能说是“不务正业”呢？再一个就是办了新闻研究所和新闻研究生系，说它是“不务正业”，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迂腐得好笑了。新闻研究是应运而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办报的要求，对我们新闻事业的拨乱反正和扩大新闻队伍是迫切需要的。我认为，研究所应该成为报纸的

一个组成部分,是报纸从办学中汲取活力和新鲜血液的基地。无论是新闻理论上的研究,还是干部的培训和后备力量的培养,办研究所和新闻研究生系都是正业。当然,我也有听起来荒唐的想法,我去张家口,在一座大山里,认识一位姓张的支部书记。他们向香港出口活牛。到了口岸,牛都健壮而无死伤,村子很穷,但办了一所很好的学校。我同他们成为朋友。那个地方羊很多,我建议他来北京开羊肉铺、羊肉饭馆。我曾对管行政的同志建议,能不能把人民日报社的墙打开一段,让那个村的活牛、活羊和做牛羊肉的师傅到北京市场上显显身手。我的话大概被认为不务正业,没得到一点反响,我自己也碰了一鼻子灰。类似的“不务正业”例子还很多。我认为,一个记者,凡是他的视觉、听觉、嗅觉所能及的地方,各种五花八门的事物,各种问题,在他的脑子里都应当作为客观世界的事物而有自己的反映,该写的写出来,该做的做出来。新闻机构和人员的职能应当是开放的。外向型的职能发挥得越多,报纸就办得越好。新闻事业摆脱官气,要有多方面服务的本领。不这样,报纸就死气沉沉。新闻工作者不仅仅是编报写文章,还要在实际工作中去寻找生活激流中千变万化的真实的现象,用以提出问题、总结经验,促进人们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就是想得多,想多做,但有时却缺乏审时度势,有时激情有余而量力不足。我有时也缺乏民主作风。“一言堂”不好,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要摆对。在办报方面,我听到了上边的意见,同时也听到了群众的意见,最后,实行总编辑负责制,作出宣传报道的决定。这种总编辑负责制不是“一言堂”,我认为这个“言”不是个人的“言”,而是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而形成了的“言”,由此可以形成报纸自己的特色,树立报纸的权威。